

GFH1000 In dialogue with humanity

俞钦扬 120020054 T06

Dr. DENG Yangzhou

Term paper

28 December 2021

现代“铁笼”之下：理性的囹圄与再超越

引言

马克斯韦伯断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¹“祛魅”标志人类理性的觉醒，也象征新一轮迷茫的起点。韦伯将现代社会比喻成理性的“铁笼”²，它冷酷无情，却又奠定现代生活必要的物质基础。

理性主义在社会生产领域的全面蔓延，或可追溯至亚当斯密与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脉络。斯密的《国富论》中，劳动分工与自由市场塑造了理性化的社会生产分配机制，最大程度增进了国民财富，为“铁笼”铸造了坚实的地基。然而“铁笼”也导致了劳动异化，损害了人类的自然天性。通过考察工人群体畸形的生存状态，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理性对经济社会的渗透，最终扩展至政治、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引发了后世学者更多维度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本文重在分析理性在生产分配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对斯密与马克思两种视角的剖析，窥见理性之于人类个体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局限。

斯密：“铁笼”的庇佑

斯密的学说立足于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虽未被确切点明，其思想却蕴含在了斯密的语境里，作为隐藏线索贯穿始终。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无时无刻不在调节生产分配中起着主导作用。

斯密首先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归功于劳动分工，并论述了分工的起因。分工源于人性中交换的倾向，这一倾向更可能是“人类理性和言语这种才能的必然结

¹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一版，钱永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9页。

²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05页。

果”³。“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⁴“乐善好施”“同情心”等感性因素无法赋予交易以恒久的意义，只能满足暂时的日常需要，而个体诉诸“自利心”⁵的理性选择却使每一项交易拥有了普遍的正当性。“自利心”驱使下，人们得以在付出劳动、换取所需的双向共赢中建立一种稳定的交换关系，从而互通有无、化差异为有用。这不仅鼓励了个体从事专门职业，也间接促进了共同财富的增长。⁶理性决定了劳动分工是促进生产的最佳方式，因为运用理性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动机，同样有利于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相似的结论适用于斯密的分配理论。自由市场被认为是实现财富分配的最优化手段，那双“无形之手”，本质上就是理性之手。市场中的理性，指个体趋利避害的本能，即用最小成本追求最大利益的目标。当商品数量与有效需求处于不匹配的状态时，生产者和消费者皆会出于自身利益，调整生产和消费行为，在自由竞争的作用下，使商品价格趋于中心的自然价格，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⁷

根植于人性的理性，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最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斯密发现了这一规律，使之作为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化大生产中，在人类迈向现代化的过程里创造了空前丰厚的物质产品和工作机器，促进了生产效率的飞速提升。以理性为基底的经济模式构成现代“铁笼”的地基，庇护着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它维持了社会生产的高效运转，为现代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输出与最大限度的物质保障，让即使位于最底层的贫困劳动者也能“享受到比任何未开化民族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⁸，最终推动了文明的繁荣。

马克思：“铁笼”的囚禁

斯密对经济规律过于理想化的总结虽成功预言了社会层面的宏观增长，却也导致了对劳动者个体层面的忽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对斯密乐观态度的反思、颠覆与修正。在斯密的基础上，马克思承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却也洞见了理性至上的后果，即对人的价值的削减、对人性的摧残。

³ 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年1月，第13页。

⁴ 同上，第14页。

⁵ 同上，第14页。

⁶ 同上，第14-15页。

⁷ 同上，第44-45页。

⁸ 同上，第2页。

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来看,由于双方权力结构的失衡,工人被贬值为“牲畜般的存在状态”⁹。这一看似反人性、反直觉的“疯论”,恰恰是理性世界的产物,是双方理性选择的结果。即使在一个财富日益增长的富裕社会,精于算计的资本家为了谋取利益不断扩张资本,劳动者为了生存激烈竞争、过度劳动,不得不完全牺牲时间、放弃自由,并伴随分工扩大与资本积累,越发依赖于“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¹⁰。最终的结果便是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降低为“最贱的商品”¹¹,化作劳动分工产业链上的“螺丝钉”,沦为“资本的奴隶”¹²,其工具性价值之外的存在价值被彻底剥夺。

而对于劳动者自身,理性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法则力量指导其生存,另一方面则作为一种与其生命力相对抗的反噬力量,逼迫其适应环境,压制其生命活性,使之屈服于资本的统治。看似自由理性的市场选择被扭曲为精神奴役。首先,工人与产品的关系被颠倒。产品成为一种“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¹³,代表着资本对个人占有空间的侵蚀。而强制性的劳动作为手段代替了原初的目的,导致工人自主性的丧失,生产活动中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使人“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¹⁴。最终,人类有意识的、充满灵性和创造力的类生活被驱逐出实践范围,人的类本质及人际关系也彻底走向异化。¹⁵

资本主义世界里,理性将“贪欲”合理化为追求利益,将“贪欲者之间的战争”¹⁶合理化为自由竞争,这一合理化的过程无疑有着斯密眼中的积极面,却不可避免造成功利主义的泛滥。当工具理性淹没价值理性¹⁷,此种理性的偏颇使得生产活动的目的趋于单一和片面,生产取代了生活本身,计算利益和衡量得失成为决策的唯一路径。即使如斯密设想的、在宏观层面健康运行的社会生产模式,却在个体层面挤压了发展空间、禁锢了自我求索。理性“铁笼”以其冰冷的异化力量扼杀人性、钳制自由,磨灭了内在的生命意义、阻碍了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

⁹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

¹⁰ 同上,第120页。

¹¹ 同上,第155页。

¹² 同上,第121页。

¹³ 同上,第157页。

¹⁴ 同上,第159页。

¹⁵ 同上,第161-165页。

¹⁶ 同上,第155页。

¹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行逻辑的批判，实质上也是对理性的批判。

结语

理性主义的崛起造就了现代化的丰功伟绩，却也诱发了深刻的精神危机。社会生产只是理性化过程中的冰山一角，却也是最重要的一隅。从斯密到马克思时代，现代“铁笼”的雏形基本成型。人类借助理性，突破了原始落后的生产分配方式的局限，实现了“第一重超越”，即对社会物质基础和经济财富的超越。然而，对于理性本身存在的囹圄，人类仍有待实现“第二重超越”，即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捍卫存在价值与激发生命潜能的精神超越。马克思对此提出的激进改革式的解决方案尚不够成熟，马尔库塞的“主体性变革”、哈贝马斯“系统以外的生活世界”，都不断在为这一困境探究可能的出路。如何实现理性的再超越，是现在式与未来式的命题，是思想家们的使命接力赛。而作为对历史的鉴戒，刘擎教授那一句“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¹⁸，或许是对这个命题最好的注解。

（2883 字）

参考书目：

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译. (2010). *学术与政治*(第一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 (2006).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亚当斯密，唐日松译. (2005). *国富论*. 华夏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2014).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刘擎. (2021).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新星出版社.

¹⁸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新星出版社，2021 年 1 月，第 288 页。